

中国与全球化： 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the Beijing Consensus, or What?

● 黄 平 崔之元 ◎ 主编

“北京共识”还是“中国经验”？

黄 平

北京共识

乔舒亚·库珀·雷默

华盛顿共识简史

约翰·威廉姆森

后华盛顿共识的共识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从“扩展的华盛顿共识”到“诊断法”

——反思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政策

丹尼·罗德里克

诊断法 —— 构建增长战略的一种可行方法

丹尼·罗德里克

对中国之路的初步认识

胡鞍钢

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

崔之元

热话题与冷思考

——关于“北京共识”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对话

俞可平 庄俊举

中国与全球化：

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the Beijing Consensus,
or What?

黄 平 ◎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黄平,崔之元主编.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8
ISBN 7-80190-695-0

I. 中... II. ①黄... ②崔... III. 经济发展 - 研究 - 中国 IV. 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6174 号

中国与全球化: 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

主 编 / 黄 平 崔之元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责任部门 / 总编室
项目经理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祝得彬 王晓蕾
责任校对 / 林 之
责任印制 / 同 非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客户服务中心 (010) 65285539
法律顾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智力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9 × 1194 毫米 1/32 开
印 张 / 10.25 字 数 / 226 千字
版 次 /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80190-695-0/D·222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2005-3941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23.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客户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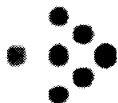
黄 平

男，伦敦经济政治学院（LSE）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ISSC）常务理事，《读书》杂志执行主编，《不列颠社会学杂志》、《比较社会学》、《当代社会学》国际编委。

主要从事社会发展与流动、区域协调与全球化问题研究，主要著作有《寻求生存》、《未完成的叙说》、《与地球重新签约》、《最新社会学人类学词典》等，近来有《健康：发展不能超越的底线》、《为什么要“以人为本”？》、《全球化的另一面》、《区域发展格局问题》、《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等探讨发展问题的文章发表。

崔之元

男，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访问研究员。1963年生于北京，1985年毕业于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与应用数学系。1995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后任教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至2002年。主要研究兴趣在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哲学领域。主要著作有：《“看不见的手”范式的悖论》和“Sustainable Democracy”（与Adam Przeworski等合著，1995）等。



本社承蒙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授权独家出版《北京共识》中文简体字版。

《北京共识》最初由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于2004年出版，是该中心“中国与全球化”项目的首个出版物。该项目最初于2004年5月由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唐宁街决定开始运行。

“中国与全球化”项目致力于通过一系列研究、出版、高层论坛和公开讨论，在更大范围内吸引更多的人来思考全球化对中国社会经济产生的问题，以及中国经济崛起对全球化的未来所产生的影响。

英国外交政策中心是领先欧洲的智囊团，接受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的指导，发展公平和规则基础上的世界秩序。我们发展和传播下列理念的创新性政策：

- 有效的全球问题多边解决方案
- 民主和良好治理的国家，并以此为秩序和发展的基础
- 与私人企业平等合作以提供公共物品
- 通过有效的公共外交支持进取性政策
- 包含性的公民关系界定，以支持国际主义政策

外交政策中心已经出版了一系列由关键思想家撰写的研讨性出版物，其主题涵盖了从欧洲和国家安全的未来到非政府组织在政策决策中的身份和角色等，包括《多边主义之后》（*After Multiculturalism*）、《后现代国家与世界秩序》（*The Post-Modern State and the World Order*）、《网络欧洲与公共外交》（*Network Europe and Public Diplomacy*）、《贸易身份》（*Trading Identities*），以及《先发制核恐怖主义》（*Pre-empting Nuclear Terrorism*）等出版物。

该中心开展有很多不同的事件研究项目，允许来自工商界、政府、非政府组织、思想库及学术机构的人参加进来，与演讲者进行互动。这些研究者都是来自全世界的首相、总统、诺贝尔奖获得者、全球性大公司领导、活动家、媒体高管和文化企业家。需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fpc.org.uk。

CONTENTS 目 录

“北京共识”还是 “中国经验”? (前言) / 1	I	黄 平
北京共识 / 1	II	乔舒亚·库珀·雷默
华盛顿共识简史 / 63	III	约翰·威廉姆森
后华盛顿共识的共识 / 86	IV	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
从“扩展的华盛顿共识”到“诊断法” ——反思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政策 / 103	V	丹尼·罗德里克
诊断法——构建增长战略的 一种可行方法 / 131	VI	丹尼·罗德里克
对中国之路的初步认识 / 146	VII	胡鞍钢
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 / 179	VIII	崔之元
热话题与冷思考 (代后记) ——关于“北京共识”与中国发展 模式的对话 / 198	IX	俞可平 庄俊举
附录 The Beijing Consensus / 216	X	Joshua Cooper Ramo

目录 CONTENTS

Preface	
“The Beijing Consensus” or “China’s Experience”? / 1	I <i>Huang Ping</i>
The Beijing Consensus (Chinese) / 1	II <i>Joshua Cooper Ramo</i>
A Short History of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 63	III <i>John Williamson</i>
Post Washington Consensus Consensus / 86	IV <i>Joseph E. Stiglitz</i>
Rethinking Growth Policie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 103	V <i>Dani Rodrick</i>
A Practical Approach to Formulating Growth Strategies / 131	VI <i>Dani Rodrick</i>
A Preliminary Understanding on the Road of China / 146	VII <i>Hu Angang</i>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the Second Liberation of Mind / 179	VIII <i>Cui Zhiyuan</i>
Postface	
Hot Issues and Cold Thoughts; An Interview about The Beijing Consensus and China’s Model of Development / 198	IX <i>Yu Keping, Zhuang Junju</i>
Appendix	
The Beijing Consensus (English) / 216	X <i>Joshua Cooper Ramo</i>

SUBTITLES
次
目

I / 黄平

北京共识”还是“中国经验”？（前言） / 1

II / 乔舒亚·库珀·雷默

北京共识 / 1

寄语中国读者 / 1

一 北京共识：论中国实力的新物理学 / 3

二 关于中国发展的一些有用的原理 / 8

三 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能量转移问题 / 22

四 与中国打交道 / 45

III / 约翰·威廉姆森

华盛顿共识简史 / 63

背景 / 64

最初政策清单的内容 / 66

最初的反馈 / 68

多样化的解释 / 71



关于未来 / 75

结束语 / 83

IV/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

后华盛顿共识的共识 / 86

正在兴起的一种共识的几个元素 / 98

V/丹尼·罗德里克

从“扩展的华盛顿共识”到“诊断法”

——反思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政策 / 103

下一步是什么? / 109

扩展的华盛顿共识 / 109

寻找替代：经验记录显示了什么? / 112

增长战略的诊断方法 / 115

结束语：关于经济学家和政策建议 / 120

VI/丹尼·罗德里克

诊断法

——构建增长战略的一种可行方法 / 131

引言 / 131

第一步：发展诊断 / 136

第二步：政策设计 / 139

第三步：改革的制度化 / 142

小结 / 144

VII/胡鞍钢

对中国之路的初步认识 / 146

一 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记录 / 148

二 中国发展模式的演进 / 153

三 中国发展对世界发展的贡献 / 167

四 中国之路的特点与经验 / 171

五 小结：我们需要不断探索中国之路 / 177

VIII/崔之元

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 / 179

一 引言 / 179

二 新进化论与制度形态的无限性 / 180

三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启示 / 184

四 批判法学：超越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分法 / 188

五 批判“制度拜物教” / 191

IX/俞可平 庄俊举

热话题与冷思考（代后记）

——关于“北京共识”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对话 / 198

X/ Joshua Cooper Ramo

附录 The Beijing Consensus / 213



“北京共识” 还是 “中国经验”？（前言）

黄 平 *

“北京共识”这个说法是雷默先生讲的，按中国的标准，这位雷默还很年轻，他以前为《时代》杂志做编辑，在北京住了几年下来，越来越觉得拿西方现有的关于中国的“框框”（Stereotypes）来看中国当下的发展有问题，甚至有偏见，怎么也说不清楚，于是提出这么个新的说法，以区别于“华盛顿共识”。很多人会说，哪有什么北京共识啊？我们不是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吗？

的确，我们是在摸索、探索，其中不乏分歧、争论，很多问题并没有形成“共识”。而雷默本人的意思恰恰是说，不论这里有多少问题、风险、不确定性，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中国没有简单遵从“华盛顿共识”：

* 本文的部分内容，曾摘发在黄平等《迈向和谐》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北京共识从结构上说无疑是邓小平之后的思想，但是它与他的务实思想密切相关，即实现现代化的最佳途径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试图采取“休克疗法”，实现大跃进。^①

其实，即使连所谓“华盛顿共识”，在华盛顿也是没有多少人知道的，更不用说有什么“共识”了，那不过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之间很少部分人之间的“共识”。本书所收录的威廉姆森的文章对此有很清楚的说明，“‘华盛顿共识’这个术语最初是在1989年提出的。在国际经济学研究所举办的一个会议中，我在论文中第一次使用‘华盛顿共识’这一书面语，用以衡量经合发组织一直认为适当的系列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取代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主导拉美经济政策的发展经济学旧观念。”^②

我第一次听雷默先生谈他这个“北京共识”，是2004年5月我们在伦敦举办论坛的时候，那时英文版的文章还只是个初稿，我当时印象比较深的是，他一上来就说“两个最无视‘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印度和中国——则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诸如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等‘华盛顿共识’的忠实追随者却付出了社会和经济代价！”^③

从2004年5月到现在，一年多过去了，《北京共识》也不

① 雷默：《北京共识》，见本书第6页。

② 在这个意义上，“华盛顿共识”是比“新自由主义”新得多也窄得多的东西，更不用说比“新古典经济学”了。

③ 在正式发表的时候，这个句子挪到了整个论文的中间部分。



胫而走，先是在《参考消息》，后是在各种网络上，都有体现。我的考虑是，问题不在于是不是有所谓“北京共识”，而在于：身为中国学者，我们自己对于中国近三十年来变化有什么说法没有？如果还没有“共识”，有没有诸如“中国经验”或“中国道路”这样的可能；不只是罗列一些大家都看得到的现象，而是某种概括甚至是“模式”？

我们过去有一句老话，“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这是毛主席讲的。这个话教育了我们很多年，那个时候我们叫“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最终是要“解放全人类”。但究竟什么叫对人类有较大贡献？我们过去是不清楚的。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有一个解释，叫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就是对人类的最大贡献。而什么叫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我们有很多年也没搞明白。转眼间到了1989年，因为发生了天安门事件，西方就开始封锁中国，重新改变对华政策。我们1978年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在西方基本上是受到欢呼的。在我自己的印象中，1980年代中期我在欧洲，那边的舆论说到中国什么都是好的，那会儿是说到苏联什么都不好，而到1989年以后一下子翻过来了，一说苏联什么都是好的，一说中国什么都是负面的。^①1989年以后中国的《政府工作报告》连续几年都讲，我们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用这么少的耕地养活了这么多的人，解决了十几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这是人类历史上了不起的事情。那个时候我还在英国，当地人不明白这个事。英国人老问我，说你们中国

① 这个情况直到现在也完全没改过来，甚至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也不断出现。雷默的《北京共识》部分地也是要回应这个问题。



人到底要吃多少饭，他们就是不懂这个事，解决了吃饭问题，怎么就是个伟大的贡献呢。我说你们是所谓的“富裕社会”，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啊！

我们过去多少年来，至少清朝中期以后，吃饭问题就成了头等大事。19 世纪后半期到 20 世纪前 50 年，这 100 年中许多动乱、起义、革命、战争，都与吃饭问题没有解决好有密切关系。孙中山提出要“耕者有其田”，但并没有真正解决，后来经过土地革命，搞了土改，才奠定了一个坚实的社会基础。^① 1950 年代以后又有合作化的努力，集体化的努力（包括“大跃进”），都是试图要把亿万农民组织起来，一个是为了解决多少年来的“一盘散沙”和“任人宰割”的问题，另一个就是要解决粮食生产或吃饭问题，那时叫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的问题，现在叫“粮食安全”问题。中国这么大，一方面粮食不可能完全依靠外援；另一方面，虽然中国面积大，但是（人均）可耕地少得可怜，南北东西自然差距大得惊人，要解决这么多人的吃饭，如果不组织起来，就可能今天这里水灾那里旱灾，逃荒啊，难民啊，在所难免，到了极端就是骚乱和起义。于是，在搞完土改后，就要搞合作社，“大跃进”失败后，也只是退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还是为了有个集体做基础，不至于两极分化。后来“文化大革命”期间就“全国学大寨”，听起来是很激进的方案，要几千年的小农走高度集体化的道路，怎么可能呢？但是在实际层

① 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恐怕是惟一经历了全面土改的。这个成果，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享受，但却很少意识到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土改，包括 1980 年代初的分田到户，今天的中国将不知道有多少人流离失所，成为“无地—无业—无家”的难民。



面，“农业学大寨”的一个很具体的内容实际上是要解决吃饭问题，那会儿南方叫“过长江”，北方叫“过黄河”，要解决粮食亩产问题。1975年，毛主席身体已经很不好了，还不断问，为什么粮食产量大寨做到了，别的地方做不到，一年做不到，三年行不行，三年做不到，五年行不行，五年做不到，十年行不行？所以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还专门到大寨去开了个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并代表中央做报告，要解决粮食产量问题。老实说，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们多少年，一直到1978年的改革，才又由农民自己摸索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叫“交够了国家的，留足了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一直到今天，我们说改革的伟大成就，第一个还是这个，通过改革，基本解决了粮食问题、吃饭问题。

不仅如此，现在的问题确实是不一样了。近代以来多少年一直都有饥荒灾害，难民流离失所，现在则是粮食吃不完、藏不好，种粮不划算。即使在宁夏、甘肃、山西、内蒙、云南、贵州，在这些地区的贫困县，许多偏远山村的老百姓也藏粮不少，他们已不怎么担心饿肚子、揭不开锅，而是怎么避免藏粮被老鼠吃掉或避免霉掉、烂掉。现在饿肚子揭不开锅的情况已经很少了，除了内蒙、新疆可能因为一场大雪羊死掉了很多那种灾害外，在正常年景下，吃饭对绝大多数中国人已经基本不是什么大问题，所以说我们不仅是脱贫，甚至也不仅是基本解决了温饱，而是进入了初步的小康。从毛主席讲“中国应该对人类有较大贡献”，到1980年邓小平说“把中国人的事情办好就是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再到1989年以后连续几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用这么少的耕地解决了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如何了不起，再到



今天，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下来，就要求我们回到中国发展的道路问题上来，就涉及到下一步怎么走的问题。我们过去二十几年的发展与改革开放，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不仅用如此有限的耕地解决了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我们讲“中国特色”，当然可以列出许多，但第一个其实就是“人多地少”），而且在许多领域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现在的问题是片面追求高增长（例如从技术上说以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为代价的增长，或者从结构上看以扩大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贫富之间的差距为代价的增长），还是在新的发展观指导下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更进一步“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提出来的。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原来讲的“实现现代化”不是完全一样的。最早提出的是工业化，从晚清民国就提出来了，晚清的富国强兵啊，民国的强国富民啊，都是要迎头赶上，要使中国也工业化。到了“五四”，提出“赛先生”与“德先生”，就不只是经济上如何工业化了，而有了要把中国建设成现代社会的意思，后来军阀混战以及日寇入侵打乱了这个进程，不得不通过革命（特别是土地革命），革命以后再搞工业化。1950年代是第一个高潮，到了1964年提出“四个现代化”，包含了在工业、农业、科技、国防领域的现代化，1975年四届人大上总理抱病做政府工作报告，又重申了这四个现代化。1977～1978年以后再把它作为各项工作的重点。而这里的重点还是工业化。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过去讲的工业化，基本是以西欧特别是英国的经验为基础的。而在西方近代历史上，工业化不只是一个



单一的技术化过程，它是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等共同构建起来的一整套从制度到观念的东西，即所谓的“现代性”密不可分的。但是，这绝不只是一个人口比重意义上的“城市化”（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或城市人口比重越来越大）的过程，而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它是通过对内建立雇佣劳动与剥削，对外侵略扩张、殖民移民，并把这两个过程都从文化－意识形态上加以合法化来完成的。那么如果中国也要搞工业化，既不可能对外搞侵略扩张，对内甚至也不能够通过搞剥削，所以搞了集体化、合作化、公私合营什么的，想用社会主义的办法来搞工业化。这个问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怎么从理论和实践上不重蹈资本主义覆辙，怎么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西欧的工业化还有一个问题，它是第一次以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方式远离自然、破坏自然。农业文明虽然没有采集和狩猎那么接近自然，但基本还是个自然经济形态。自有人类文明以来，最早是狩猎、采集，到第一次定居是农业文明。农业文明一个是定居了，一个是依赖对土地的开垦。比较早的文明形态包括我们今天说的中华文明这种形态，晚近也有通过大牧场的，那是把农耕也工业化了（Industrialization of agriculture），而我们一直是小农为主，直到今天几亿农民分散作业，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也是基本的国情之一。

而工业化呢，首先一个特征是远离自然，把人组织到非自然的环境下，或者是创造出一个个诸如工厂、车间那样的东西，这些东西都集中在城市里，来搞生产、流通、交换、分配、消费；不仅远离自然，还要把大自然作为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包括森林、矿藏、木材、淡水，一直到整个自然的一切，乃